

西方人看西方



西方人看西方

周经 编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东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21 开本 6 印张 180 千字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2—0277—1/C·5

定价： 2.80 元

- 讲求实际的一代 [1]
愤世嫉俗的日本青年 [3]
法国青少年的内心世界 [6]
法国青年怎样看待未来社会 [9]
美国：缺乏竞争力的下一代 [11]
德国青年的文化生活 [14]
西班牙的青年人 [18]
日本青年的三大关键选择 [19]
巴黎大学：金玉其外 [21]
牛津大学见闻 [23]
美国青少年的职业教育 [27]
美国高中教育：理想和现实的反差 [30]
忘记了方向的日本教育 [33]
华盛顿：谋杀之都 [36]
英国的无家可归者 [38]
美国国会议员的生财之道 [42]
东京贫民窟——山谷 [46]
亿万富翁生活面面观 [49]
美国有工作的穷人 [53]
在日本求职做事难 [57]
贫富悬殊的日本 [60]
日本的新一代女性 [62]

纽约—东京：迥然不同的国际城市 [65]
美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演变 [67]
美国文化初探 [70]
法国人的服装、时尚与仪表 [73]
新纳粹火苗愈烧愈烈 [75]
今日美国：拜金的社会 [77]
西方社会离婚种种 [79]
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威胁 [82]
伍德斯托克现象 [87]
在虚无鬼域流浪的灵魂 [90]
法国：社会与小偷 [92]
西欧的外国移民 [96]
美国 80 年代一瞥 [99]
在美国吃大锅饭 [101]
美国新闻界从白宫看天下 [103]
美国的衰落已不可逆转 [105]
美国企业界的信任危机 [108]
“纽约沦陷了？” [110]
洛克菲勒王朝兴衰录 [111]
美国报业及电视面临生存危机 [115]
美国的信用卡战 [118]

讲求实际的一代

[美] 布鲁斯·韦伯

这里要讲的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爱情故事。24岁的克拉克与25岁的怀特都长得挺漂亮,3年前他们在大学一见倾心,于是就在一起生活了。大学毕业后,一个在体育用品及管理公司工作,一个在广告公司工作。他们仍然相爱。

她说:“我们很合得来。”

他说:“我们用不着整天厮守在一起培养感情。”

他俩都赞成双职工家庭,这在他们的上一代业已成为习俗。怀特打算30岁成家,当一个大龄父亲。克拉克则说:“到30岁我肯定会结婚了,如果不结婚,我就到摩纳哥海滨去裸体滑水,尽情放纵。”她笑了笑又说:“不过,我还是会结婚的,工作也要干出点名堂来。有家,有狗,先不要小孩,不过最终我还是会要孩子的。”

1986年冬,笔者走访了一些城市,采访了许多大学生,内容是有关婚姻、男女关系和现代爱情。我所以搞这样的调查,是因为我和许许多多的人都曾有过这样的印象:由于经商和从事股票交易成了热门,年轻人深受其影响,他们自命不凡,高人一等,汲汲于功名利禄。我还认为,现在的大学生虽然比我年轻不了多少,却处事圆滑、唯利是图。

我一共采访了60多个人,希望通过非正式的交谈来了解这代人的思想情感。他们的年龄都在22—26岁之间,虽然出身不同,政治观点迥异,理想与抱负亦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都住在市区,没有同性恋者。

当初我们那代人认为,爱情意味着胜利,爱的激情、爱的誓约不论多么天真,都是一种力量,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将获得这种力量,从而改变整个生活。

现在的年轻人可不这么认为了,他们变得老成持重。所谓“爱情至上”的说法早已不时兴了。

这代年轻人一切以“我”为出发点,当然在我看来这倒无关紧要,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所不同的是这代年轻人太看重自我了。

这也难怪,他们成长之时,正是旧传统几近消亡之日。自1975年以来,美国的离婚案例每年高达100万起,也就是说,有一半的家庭终于以离婚而告终。女权运动的伟绩,尤其是妇女加入劳动力大军,已经改变了以往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男女乱交、性试验——一种对全社会的腐蚀——引起的疾病正在像瘟疫般地蔓延开来。

大学刚毕业,年轻人就痛感住房问题的严重。他们对经济繁荣的预测丝毫不感兴趣。据一份人口统计杂志调查,年轻人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比前3次调查要高。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清醒地意识到,前途未卜,夙愿难偿,等待他们的将不是什么新奇而是混乱。与我交谈的人看问题都是非常有保留的,他们不耽于幻想,选择谨慎,循规蹈矩,目标是享受繁荣,诸事平安。一路上,我曾同几个人聊天,他们告诉我说,现在的大学生可实际多了,他们谈性生活,谈事业与婚姻,就是不谈爱情。

他们在言谈话语中流露出强烈的自信心和事业心,只希望过单身生活,有一份好差事,外加同事间的友谊与尊敬。

25岁的迈卡·梅特刚刚从广播电台实习归来,她想当一名记者。她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在恋爱婚姻问题上颇具远见。她说:“1986年秋天,我跟一个小伙子谈恋爱。他是股票经纪人,职业满不错,对我也好。但后来他谈起他的家庭纠葛,于是矛盾出现了。我想我要是跟他结婚,往后出了问题可怎么办?趁早分手吧。”

这代人的大多数太年轻了，不曾记得刺杀肯尼迪事件，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年龄还是赶上了一点浪漫的潮头。他们都有过失恋。令我奇怪的是，他们并不因此而心碎，而消沉。他们总是用平静的口吻回答说，失恋可以使人吸取教训，变得更加成熟，我们年纪尚轻，不会因此而一蹶不振的。

例如，25岁的彼得·芒迪就有过类似的教训。半年前他交了不少女朋友，他想体验一下浪漫，结果得到的却是一连串的痛苦和压力。他感到了世态炎凉，人心莫测。回顾往事，也发现自己干了不少蠢事，光阴虚度了。

得克萨斯州大学24岁的毕业生汤姆·格罗斯说：“我不愿谈结婚，坦率地说，我也不打算结婚。”另一位已当上经理的大学毕业生说道：“我首先想的是发财，事业第一，我要为此而奋斗。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的了，我可不想让婚姻再搅和进来。我的观点是及时行乐。”

哈佛大学去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妇女一过30岁结婚的机遇就会迅速减少，女大学生对此感到忧心忡忡。她们大学毕业后，理应全心全意地干上几年工作，但又担心错过了谈恋爱的好年华，事情难以两全。

尽管如此，许多女大学生认为，职业带来的经济独立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图个人功名，也是今后找对象的一种资本。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生珍妮·拉赛尔说道：“我期望结婚，但是生活在一个很自私的社会里，我必须要有我的事业才行。当然，也许有一天当我寻找丈夫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了。”

女学生心目中的男子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她们找对象的标准又是什么呢？23岁的莱丝利一口气说了一大堆：“首先要长得帅，其次有幽默感和传统价值观念，再其次是功成名就，最后还要有一个好的家庭背景。”她接着又说：“这并不是我眼界太高，而是我配得上最好的人。”

虽然离婚率很高，我所采访的大多数学生还是打算结婚的。他们认为婚姻不仅是美好的，也是必然的。但比起父辈来，他们则更慎重，更务实。据统计，1985年中年男子第一次结婚的比例为25.5%，中年妇女为23.3%。

现代年轻人中有大量的独身主义者，但是他们确实不如以前那么纵情于声色了。

当然对爱滋病的恐惧是最主要的原因。一位25岁的出版社经理说道：“我从交朋友的第一天起就没完没了地谈论爱滋病，我对跟我约会的每一位朋友说：‘先去检查一下有没有爱滋病。’”

1986年秋季，高等教育研究协会对30万大学1年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这批大学生的生活目标更加实际了。认为最重要的是生活富裕的学生上升为73.2%，1980年为63.3%，而1975年仅为49.5%。他们认为生活中重要的还应包括：工作能得到他人的赏识；当领导；成名成家；建立家庭。然而，认为生活应富有意义的人从1975年的64.2%下降为1986年的40.6%。

当问到理想伴侣应具备哪些品质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说，理想的伴侣应受过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有理想有抱负。而没有追求、没有奋斗目标的人是毫不足取的。

亚历克斯·格拉门特是我采访的最后一位大学毕业生。他是我的高中学生，长得仪表堂堂，颇有些文人气质，忧郁，缺乏远见。他告诉我说，《呼啸山庄》中的男主角，那位疯狂的、感情用事的希思克利夫是他浪漫主义的楷模。大学毕业时，他的长篇论文《论阿尔伯特·加缪》正式出书了，为此，他很得意了一番。他先是申请攻读比较文学硕士，由于兴趣不高，又改学法律。

他还告诉我说，1986年夏天他到西德去追一位大学的女友。他本想在西德与这位女朋友长期生活下去，结果只呆了两个星期就跑了回来。他振振有词地引用了加缪的名言：“爱情要么是瞬间的燃烧，要么是持久的感情，二者不可兼得。”亚历克斯对前

途是悲观的,他说:“每分钟都必须有所收获,否则我就感到是在虚度年华。现在有许多压力在左右我的生活。我是个浪漫主义者,但我所生活的时代却毫无浪漫可言。”

(美《纽约时报杂志》,良月摘译)

愤世嫉俗的日本青年

[德] 沃尔夫·屈斯特

教师一边用右手有节奏地敲击着讲台,一边高声地向他的46个学生念着英语单词“歇斯底里”。全班学生则齐声重复着这个很难发音的单词。

这是东京一所重点中学11年级的英语课。就像上其它课程一样,他们拼命死记硬背,毫无思想地堆积着各类知识。教学大纲要求的就是这样,规定每天上7堂课。对大多数学生来说,真正的功课在放学以后才开始。

例如Y君,他是东京一个高级政府官员的公子。他放学后还要去一家私人补习班补习英语、数学和日语,每周6天,每天3小时。升入高一级学校,直至大学是日本教育的标准和目标。Y君的父亲每月为这样的补习课支付近2000马克。

然而,Y君这个模范学生不再就范了。数月来,他不再去上学,而是在东京一家称作“萝卜”的小迪斯科舞厅打短工。Y君无意寻找一份固定工作。况且,在日本像他这样的逃学者找固定工作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Y君并不代表所有的日本青年。但是,他却代表着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使老一代日本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数十年来孜孜以求欲达世界上最高教养的日本社会已在边缘出现了裂痕。

94%以上的日本青年在9年制义务教育结束后进入高级中学直至毕业,这在世界上堪称第一。38%的同龄人决心上大学,这也是世界第一。

然而,日本青年突然而起抵制这种读书的压力,尽管这种压力是日后飞黄腾达的保证。

80年代初,愤世嫉俗者在日本还鲜为人知。到1985年,已有12.5万青年人自愿提前离开高级中学,干脆放弃职业上的成功之路、优裕的生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在以勤奋著称的日本是罕见的。

20岁的S君自家乡长崎来到东京考大学。名落孙山后,他本可以按父母之意和传统的日本意识在首都一家较大的公司当个职员来碰碰运气。

因为公司愈大,工作愈没有风险。日本公司不解雇固定职工。至少公司传统的荣誉感和带有儒家色彩的对职工的责任感需要它这样做。

S君本可以进入这样的企业,因为有人提供过这样的机会。不过他对此毫无兴趣,他要“自由自在”,因而决定做“临时工”,作为他未来人生的基础。

S君自认为是一个流浪者,他到处游荡,没有固定住处。他也知道,在同龄人中,他有千千万万意气相投者,他们厌恶那僵化的、直至退休一直囿于狭小天地的终身职位的日本传统。

青年人为了个人自由,认为不安定的、大多报酬也较少的临时工作比终生依赖一家公司要好。

从这种突然出现的现象中,日本经济界的重要部门尤其是服务业获利不少。

例如,大都市中有无数酒吧和啤酒馆人手全部依靠雇用这些临时工。这些人要求不高,报酬也很低。每小时工资600日元以上的极为少见,更没有任何福利待遇。

东京附近昂贵的迪斯尼乐园现有职工7000人,其中固定职工不足1/3。5000名

青年人在那里打短工,有的已有数年之久。令人惊异的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

例如,24岁的M女士是东京某学院的毕业生,自1983年以来一直在迪斯尼游乐场打工。与安定、刻板、无聊的机关工作相比,这里的“自由程度高”,更吸引她,尤其是这里不需要加班。

M君曾经是个好学生,考试一向名列前茅。作为东京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完全可以在机关或一家重要的工业企业任一名科长,成功地走上就业之路并获得终身俸禄,收入丰厚,无忧无虑。他的父辈就是这样过来的,他也可以走这条路。因为这是日本企业界的成规。

然而,M君跳槽了。他说:“当今,日本这么富裕,人们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兴趣谋生。”M君迷上了电子游戏,挖空心思使这种发出刺耳声响、折磨神经的儿童游戏花样翻新并以此度日。

能维持多久呢?M君说:“我只做一个星期的打算,然后再想下个星期怎样过。为将来达不到的事情伤脑筋不好。”

M君并非个别例子。1986年3.2万名年轻的大学生拒绝受聘固定职业。东京某大学一位系主任认为:“日本青年没有前途了,他们只是得过且过。”

一位年仅38岁的日本社会学家也说:“我们再也无法理解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使日本有今天的一切,如纪律、工作、谦虚和服从等,都表示怀疑。可以说,他们不是日本人。”

半官方的日本电视台不久前通过电视屏幕向全国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年轻的这一代仅仅是日本业已达到消费社会的结果吗?或者,这果真是一种‘新的人生观’?”

“新的人生观”这一时髦说法出现在日本大众媒介已有两年之久。

在意见调查中,2/3以上的日本青年表示,对他们来说,个人生活,不管是独居还是在家庭,都比他们将要进入或已在其中就业的企业更重要。工人和职员如今要求每年真正休假一次,而不再满足于延长周末。日本工人法定每年有22天休假,可是为了公司和自己的升迁,他们大多没有休息。

与世界上某些国家相比,“新人生观”的要求还是很低的,彻底的愤世嫉俗者的数量与欧美相比也是微乎其微的。不过在这个传统根深蒂固,用社会学家N女士的话来说“沉缅于自身的岛国气质”的王国,青年人生活观的这个变化不啻为一场毁灭性极强的地震。

因为正如东京一位71岁的企业家所说:“这种变化使我们曾经信仰过的,以及这些青年的父辈为之奋斗过的一切都成了疑问。”

一位记者在《日本季刊》的通讯中写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在一个企业里,‘新人生观’的一位典型人物突然决定在企业业务最繁忙时去休假。一段时间后,他回来了,晒得黑黑的,精神抖擞。这时,他的上司才知道他是去滑雪了。而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同事却不得不承担起他的工作。为此,上司责备这位青年,双方发生了争吵。”

报道的结尾写道:“而这位青年人的同事认为他去滑雪没有什么。他们认为,这总比公司里堆积着的那无穷无尽的工作更重要。”

关键正在这里:日本青年正是用这种疲惫的工作作风腐蚀着日本的自信,招致“日本的毁灭”。上述记者引用一位保守派政治家的话说:“如果不对此采取行动,‘这类新人’就会像美国人那样懒惰和游手好闲。”

对工作勤奋的推崇源出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日本在二次大战中城市变为一片废墟,必须东山再起。

成功造就神话。父辈们为企业效力,卧薪尝胆地苦干。因此,日本工人全身心地

效忠于企业。他们毫无怨言地承担着每周 48 小时的工作，连工会也毫无怨言。下班后他们几乎天天集体痛饮，由公司出钱。《每日新闻》不久前毫无讽刺意味地指出，这种集体酗酒“对班组团结和提高生产力有促进作用”。

日本工人和职员用这种无与伦比的牺牲换来的是安定。因为雇主用终身职位来回报职工的忠诚服务。

即使在经济危机时期工作岗位也是保险的，薪金年年增加，不按学历，只看资历。这就是所谓的“年功序列”原则，它同样也用于职位的晋升。

年满 55 岁则退休，能获得相当于 2 至 3 年工资的可观过渡金。前不久的意见调查证实，2/3 的日本人终于想和妻子一起去旅行一次，以补偿他们多年来对妻子的忽视。

现在，日本青年一代不这样干了。显然这是因为他们受这种制度阴暗面之害过深的缘故。例如，由于工作负担过重造成传统家庭的解体。

过去的 10 年中，日本离婚率增长了一倍。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曾是日本社会的支柱，现在几乎已经绝迹。摧毁社会联系的城市化势不可挡。一代人之前，日本人大多还住在乡村，如今 76% 的人口集中在大城市。

但更主要的是青年一代意识到了他们父辈所谓的终身职位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幻想。由于经济严重衰退，至少有 40 万劳动力过剩。日本的失业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3%。为此，日本企业主们创造了一种解脱模式：“自愿”提前退休或“转业”。

有时他们求助于一种服务公司，这种公司以劝说那些任职多年而年事渐高、当前却成为过剩的职工提前退休为专长。对此，服务公司可以拿到相当于退休者年工资 20% 的酬金。

东京一家名为“人材咨询系统”的服务公司的老板 I 君说：“尽管如此，对于企业来说这也比让那些职工坚持到原定退休年龄要合算。”I 君还认为：“终身职位已经不复存在。”

另一家公司的老板 T 君说：“日本的企业无法继续负担过剩劳动力。因为这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工人面临着困难时期。”

东京《文艺春秋》杂志书刊出版社干事长 T 君说：“由于许多青年人看透了终身职位这一骗局，因而积极反对终身职位。”

同时，他们也经常陷入伤感之中。

京都的大学生 H 君说：“当前，日本可算是世界第一流国家。可等到我们这代人能当家作主时，日本恐怕早已降到诸如朝鲜或欧洲的地位了。”

“下班后父亲属于家庭，而不是公司。”这句广泛流传的话道出了迄今为止卓有成效而今后将不复存在的日本模式的尾声。

S 教授说：“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日本人从未过得像现在的青年人这么好过。我们传统贫困的国家从未达到过现在的富有程度。以前，从未有过哪一代人有着像当今青年人那样大有作为的天地。但他们却缩回自己的私人生活天地并以此表示抗议。”

政治观点？谢谢，没有。参与政治生活？没兴趣。犯罪学家 M 君认为：“青年一代崇尚享乐，这和日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这样下去，他们除了得过且过没有别的前途。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泰坦综合症（泰坦——希腊神话中曾统治世界的巨人族的一员）”。

但是有人说：“全世界都在打击日本，因为日本人太成功了。但这种情况将会改变。让那些新人们干去吧，因为他们将一事无成。”

（德《明镜》，王寄萍译）

法国青少年的内心世界

[法] 雅克琳·雷米

我们不是病人

“青少年”这个词，他们是唾弃的。奇怪得很，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他们也把同伙称作“孩子”。14岁的小姑娘伊萨贝尔说：“当父母们谈到青少年时，简直就像在谈论稀奇的动物、怪人、病人。要知道，我们和其他人是一样的！”确实，他们是和其他人一样的……长到13岁的时候，若不被当成个大人，心里就会感到不高兴；可是，到了17岁的时候，有时晚上入睡前，心里又想还是过童年的日子好。这些想法，他们是永远不会对家长讲的。长大原来是如此复杂。自己的体态不是被固定的线条锁住，而是飘忽变化着。一切都在同时长出来：毛发、乳房、粉刺，还有相互矛盾的念头。自己对自己是极感兴趣的，但也并不爱自己。对别人呢？16岁的尼古拉说：“我喜欢搞点造作，让人相信他们比我强，而心里却在笑话他们。”伊萨贝尔说：“装傻比表现聪明要容易多了。所以，在很长的时期内，在大人面前我就当笨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的智商高于一般水平，于是，一下子我就变了。”孩子总要经历一段特殊的时期。他们需要和同伴们干一样的事，穿一样的衣服，听同样的录音带，一起“发疯”，心里讨厌一切人。这种状况可能持续两年，也可能只有两个月。对家长来说，两年也好，两个月也好，都长得难耐。不过，有时候，倒是孩子们在此阶段结束后更有如释重负之感。孩子们需要寻求自我，寻求他人。寻觅之后，找到了自我，接着是茫然若失，然后又重新抓住了自我。总之，青少年对父母的抱怨是：父母们回答的是孩子们没有提出的问题，治的是孩子们没有的病，抓不住孩子们脑海中真正的疑问。

上学是苦差使

“好好学习”，这口号叫人腻烦透了，你给我闭嘴吧！上学，可归纳为一个“太”字。负担太重。太限制人。课时太多。作业太多。各方面的比例太不均衡。老师呢？其行动准则是：我来教我的学，教完了就走。有的老师厉害得很，大叫大骂。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有的教师受欺负，又叫我们觉得可怜。除了个别情况——即对待几个宠儿——他们对我们讲话时像是对12岁的孩子说话一样。他们把我们视为什么也不懂的家伙。有的同学因家庭问题影响了学习，老师就不能公正地对待他们。老师们不能把我们引向我们喜欢的东西。这就是青少年们对教师的评论。他们抱怨永远不能在家长面前批评教师，家长们永远是站在学校一边。父母这不合，那不合，可是只要一涉及孩子的考试分数，意见就不谋而合了。这种“合”令人窒息。着了魔的家长逼迫13—17岁的孩子去竞争，而在孩子们看来，这种竞争是没有意义的。“除了这个，我的爸妈和我没有别的话说。”17岁的巴斯蒂安还说：“晚上，我妈下班后见到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数公布了吗？考了多少？’这真叫人恼火。”更坏的是，父母们对某门功课，比如数学，特别挂在心上。“我爸爸每天晚上问我，数学做了么？我就说，做了。其实，我并没有做。在这种消耗战中，我最讨厌数学了。”很快，考分成了家长要挟的手段。如果你的考试成绩没有进步，晚上你就别再出去玩。你也别和同学一块去野营……15岁的克利斯朵夫说：“在我们手里，好成绩能顶钱用，用好的分数能买到自由。”这还好，最难受的是父母的担心与忧虑。有的父母每两个月就问你一次：“你为什么喜欢足球而不喜欢文学呢？”有的家长就像拍小马驹一样鼓励你：“不要紧，能上得去，加把油就是

了。”他们这样说，好像这一切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命运。奥利维埃说：“老是这么说，真会叫人支撑不住的。”于是，他们在父母面前便硬充好汉，表现得“无所谓”。实际呢？自己偷偷哭泣。有那么一天，当自己确信永远达不到父母的期望时，自己一下子就彻底垮了。

我们需要胡闹

这种事儿，毫无疑问是决不会对家长讲的。一讲，什么都完了。14—15岁的孩子把胡闹叫作“调皮”，16—17岁的孩子则喜用“胡来”一词。调皮和胡来可以带来两大乐趣：一是“开玩笑”——他们疯笑起来是没完没了的；二是干违章的事。干了胡来的事，心里是害怕的，怕极了，可越怕越觉得有味道。13—14岁的孩子从9层楼上向行人投掷水弹；向老太太们做鬼脸；偷一张明信片或软头水笔；有时还抽香烟。到了16—17岁，就会半夜三更给人家打匿名电话；3个人同骑一辆小摩托；不去上课在家偷看大人的黄色录像；搞破坏玩，或者喝酒。16岁的达米安说：“我们常喝，这是真的。晚上一起玩，要是没有酒，那可就惨啦。”达米安喜欢和同伴们玩“塔夫上尉”游戏，这可以使他们狂饮。孩子们说，晚上聚会若没有一半的人醉倒，那就不算成功。喝酒都是偷偷干的，父母一般都是禁止孩子喝酒的。孩子们悄悄带着一小瓶威士忌，或小瓶的啤酒。最喜欢的还是有异国风味的鸡尾酒。14岁的伊萨贝尔说：“我很喜欢喝酒，那可以使我飘飘忽忽，飞向远方。”15岁的弗里德里克利用父母不在的机会，组织了第一次饮酒晚会。他说：“你要知道，有点酒，姑娘们才和人亲热。”而大人们，尤其是父母，太严肃了，是不可能懂得的。

给我们留点余地，让我们透透风

对，我们知道“你们当年……”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你们当年的情况了。你们在把我们养大的过程中，说了不知多少好话——“宝宝长大成人了”。但是，实际上，你们往往忘记了青少年也需要自主和被尊敬，尤其需要自由呼吸。以上就是13—17岁的青少年最爱弹的主调。他们最信奉的字眼是：自由。实际上，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比前几代人多多了。然而，像过去一样，问题的实质是他们不停地要求扩大自由的界限。自由是他们所要求的唯一的权利。要有随心所欲地穿戴的自由，要有想见谁就见谁的自由，特别是要有外出的自由。实际上，家长们对于这些要求已不再泛泛地驳回了。少数家长仍然用那种老说法来行使说一不二的权威：“就这么办，因为就应该这么办。”相反，家长们现在向孩子解释他们的决定，而孩子们则据理力争。当每周有权外出一次的时候，他们就要求两次；当有两个晚上可自由外出时，他们就要求3次……要求自由已部分地变成了惯例。在孩子们之间，大家为无权外出的同伴愤愤不平，但是对于外出次数太多的人则又有微词。16岁的姑娘拉埃蒂霞说：“我的朋友可以随意出去玩。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是有点儿过分了。她自己最后也觉得这不正常，于是给自己确定每周外出两次。”对于自由的渴望往往是出于寻求逃脱。逃脱吵嘴的双亲，逃脱学校的压力。于是就旷课。达米安说：“一般情况下，旷课是无缘无故的。有时候，在一个热闹的广场上，我也感到无聊。不过，这倒也不坏。”有些同伴的父母是宽容大度的，卡比西娜说：“让他们给老师写个条子，就不算旷课了。”巴普蒂斯特解释道：“有时候，我真不想干活，我什么都不想干，只想逃脱。”所有的孩子都梦想有朝一日能周游世界，像“无国界医生”或记者那样。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他们在床上、在脑袋里、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漫游。神游症使人产生许多幻想。“可是，上哪儿去？我倒底还是需要爸妈的抚爱呀！”有的孩子因为怨恨或因为沮丧便弃家出走，流落街头。安娜叙述道：“我给父母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想透透风，你们用不着担心。”她离家7天，为了能混下去，试用了各种办法，最后病了，被送到医院。求索就这样结束了。克

利斯朵夫总结说：“我想要的是一种有领导的自由，一种恰当的东西。”

同学就是一切

没有比同学更来劲的了。青少年们一致高声表白：“对同伴，我什么都能说。”也就是说，一切不能对父母说的，对同伴都能说；恋爱的经历，对前程的忧虑，无稽的幻想，或者是电视连续剧里的情节。伙伴们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小社会。这个小社会有着自己的法规。小社会是个试验场地。总之，是他们的秘密园地；他们愿意让这种轻松愉快的、有时甚至充满激情的友谊避开父母的好奇心。如果父母对什么事都插手的话，那怎能斩断连接两辈人的脐带呢？同伴们呆在一起，就是起斩断脐带作用的。外人切不可先入为主地对那些结伙人做出评价，弄不好会引起强烈反应。15岁的姑娘维尔吉尼说：“我爸爸妈妈又不认识他们，就一口咬定我的朋友们是小流氓，我可受不了！”他们喜欢他们的朋友，因为这些朋友很像他们自己——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的复制品或是他们的镜子，还因为这些朋友帮助他们与童年彻底决裂。17岁的安娜有过一段当“崩克”的经历。她说：“我体会到崩克们的义气，比起过去我已习惯领教的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来，他们要可爱十倍。”伙伴之间互相怜悯，互相安慰，互相夸奖，互相讲述一切，一晚上可能互通3次电话，哪怕只问一声“你好吗”。伙伴们是相互理解的，因为“大家都一样”。大家“平等地”讨论问题。他们把父母撇在一边，他们进行对比，不把事物绝对化。他们慢慢地学会了抵制父母的影响，抵制父母过分的权威，也抵制父母的溺爱。14岁的姑娘克莱尔说：“比起伙伴们来，我双倍地爱我母亲，但是我却需要与同伴呆在一起。”16岁的男孩巴普迪斯特说：“我的爸爸妈妈确实想讨我的欢心，但和他们在一起真没意思，我喜欢的是同伴们。”和同伴们在一起，不说别的，至少可以闹着玩。有些孩子喜欢玩扮演各种角色的游戏。他们说：“这可以使我们忘记一切，使我们过过冒险的瘾，使我们自信已经独立，即使这一切不过是幻觉而已。”在伙伴们之间，你想演什么角色就可以演什么角色，不受指责，远离凶神恶煞的眼光。

我们也一样，也害怕

我们怕的不是你们认为我们该怕的东西。怕的不是艾滋病。几乎所有被询问的孩子都说：“我和艾滋病没有关系。”也不怕令父母们提心吊胆的毒品。抽过连口烟（用大麻叶等毒品自己卷制而成）的人说：“抽支连口烟，尝尝味道，不算吸毒！”至于剧烈的毒品，大多数的孩子都有所防范。他们对上述的这些玩意儿并不怕。相反，前程与空虚使他们茫然；他们怕死。于是，他们就玩点并不会真正致死，但却是有些冒险的游戏。骑着小摩托在单行道上逆驶，这是最开心的了。他们和鬼神调情，他们在墓地聚会，或者几个人关在一间房子里装神弄鬼。许多13—17岁的孩子是相信有鬼的。他们让桌子转动，让玻璃杯讲话；在跳动的烛光下，他们一言不发，静坐入定数小时，以期看到冥间的信号。风清月朗之夜，姑娘们身裹白单子，站在镜子前面，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在镜中的影象，直至出现幻觉。他们对于不太正常的现象有着无限的兴趣，只不过，他们很少对大人讲就是了。像小孩子们玩布娃娃一样，他们与自杀的念头做游戏。“为了让父母变得更宽容些。”大多数孩子认为自杀同时是“怯懦”和“纯洁”的行为。16岁的尼古拉说：“我常想到自杀。它使我着迷。自己可以支配自己，这样的念头真有意思，这是对生活的报复，不用再逆来顺受了。”巴齐尔叹息道：“死亡赋与生命以意义。但是，去它的吧！我更愿意我的生命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意义。”

我们不得不扯谎

“没说的，我们是向家长扯谎的。没有一天不说谎。”我们对家长说去麦克唐纳快餐店，实际呢？溜到小女伴那里去了。我们对家长说，去某人家睡觉。要不信，就请在

晚9点打个电话问问。到时候,家长真来电话了。可是,电话机一放,就上街了。“应该承认,我们并不总是诚实行事的。我们是这样干的:不到驾驶摩托的年龄就骑摩托。不让出去玩就爬墙。大人答应可以在外边玩到午夜,我们就清晨4点再回来。”他们自己说,胡编乱造是“为了弄到点自由”。孩子们扯谎并不仅仅是因为干了犯规的事。他们为了鸡毛蒜皮的琐事也扯谎,因为他们需要不受侵犯,不被父母们的担心与忧虑所窒息。家长们为了芝麻大小的事也千思万虑,担惊受怕。孩子们扯谎还因为他们怕自己所做的事不能被理解。他们还有一种撒谎的方式,就是你问他,他不答腔。因为他们需要有自己的私生活,“偷”几个小时,哪怕听听音乐或无聊发呆也好。

长大之后无意像你们一样

你们还是比较宽容的。你们并不总会过舒心的日子。不过,我们是理解你们的。你们把我们很好地养大成人。抚养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13—17岁的孩子们说:“我们长大后肯定也这样做。”仅仅在这一点上,孩子们是想学习家长的,而且还要做得更好。对家长们只有两点指责:第一,你们对我们的自由讨价还价。当你们根本不在场的时候,你们也就没法讨价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怨恨你们,因为我们都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再说,我们能把事情办好,不像老师们说的那个样子。第二,你们听不进我们的申诉。我们不喜欢回答那种审问式的问题,这是真的。但是,当我们需要讲话时,你们充耳不闻,没有一点理解。13岁的玛丽说:“我开始对我爸爸谈起我的男朋友,他装作没听见。至于我,当我的小同伴们要对我讲话时,我都会尽量地摸透他们的本意的。”我们长大后不会模仿你们的,因为你们夫妻双双过日子的本领并不大。这一点,说实话,你们构不成光辉的样板。当今,在两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孩子的父母是离了婚的。再说,在朋友之间讲话,有一点必须注意:你决不能问,你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而是首先要问:他们离婚了吗?其次,你们这些家长也太脆弱了。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你们当中的一个人就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你们对于办公室的同事有抱怨,对老板也有抱怨。你们什么都怕,怕艾滋病,怕毒品,怕小偷与强盗。当然,我们也会碰上遭偷或被抢的事,但我们不大愿意唠叨。你们不想让我们离家一步,你们害怕我们受到同伴的坏影响。说真的,我们这个年纪容易受影响,但是,我们需要受到你们之外的其它的影响。最后,我们不想模仿你们,因为你们已经放弃了你们的梦想。你们所做的让步太多了。你们做判断过于匆忙。你们谈钱谈得太多了。你们太因循守旧了,太循规蹈矩了。“到了星期天,爸爸妈妈带上孩子到树林中游玩,这种老规矩,我可不喜欢。”还有,你们自己把自己当成年人:穿衣服像我们,讲话也像我们,难道不觉得可笑吗?

(法《快报》,鲁文编译)

法国青年怎样看待未来社会

[法] 巴·弗洛芒 热·拉姆勒

2000年即将来临。《快报》对年轻人进行民意测验的题目是《科学技术与2000年》,目的是想了解他们对近在眼前的未来世界怎么看。对于等待着他们的动荡变革和飞跃进步,青年们的回答是:“注定无疑。可是……”他们对将来发表的看法出自他们对现实的认识,是现实的写照,反映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理想愿望。

他们认为,从现在到15年内,作为一个成年人是幸运的(有73%的人这么看)。然而,生活不会更为轻松(55%的人持这种看法)。青年人都很现实。他们的愿望带有

鲜明的个人色彩。从广义上说,他们正在朝个人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产生了共同的担忧,对战争、失业、高速现代化及艾滋病感到无能为力。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战争,却为之忧心忡忡,而恐怖主义只使他们之中4%的人感到不安,他们可能从中发现一种诱人的浪漫主义情调,他们的回答与社会舆论一致。或许他们认为,那些恐怖活动只发生在个别人身上。不过,他们对战争表现出的惶恐不安是令人欣慰的。他们不像是被中立观点所左右的样子。然而,存在于无战事状态中的原子武器没有使他们放弃这种看法:他们生活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上,这里可能会发生毁灭性战争。

对失业的烦恼出自每人之口:“将来,唉,还不是和现在一样?”至于对艾滋病,社会学家波拉克认为,人们的惧怕程度取决于性功能承受能力的强弱。

青年人同意发展科学技术,因为它使生活便利。但不赞成模式化。有人提出这样一个绝妙的等式:探索=发明=进步=人类幸福。不幸的是这个公式也带来了污染、混乱、战争。另一位专家认为这是一个道德观问题:“你们看看现在的法国电视节目,它本该成为标志进步的绝妙工具,可是近年来却在一味堕落下去。简直污秽不堪!”他抱怨缺乏反对人类精神污染的措施:“我生来不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当局掉以轻心,20年后,情景将不堪设想。”可是,担心精神污染问题的青年人却只占6%。

人们对孩子不再进行教育,只是灌输知识,培养出来的孩子成了浪荡哥儿。青少年放荡不羁不再只是由于种族主义而产生的问题。紧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布杰玛说:“情形和过去完全不同。法国人的孩子和移民的后裔,都是在幼儿园和学校里一起长大的。种族主义问题对我们已不复存在,它也从不属于法国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只是由于极右派把解决社会不平等现象当作当务之急,才首先提到这个问题。”

在15至20岁的青年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感到不平等,感到孤独的人也不多。孤独感是由一种强硬的“隔离政策”造成的。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孤独却似“威逼人的迷雾”。专家们在这点上持一致的看法,青年人无知,不了解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其中一位感叹道:“由于缺乏人生经验,你怎么能让他们对自己的前景有正确的认识呢?他们只能间接地发表观点,而且人们向他们提供的信息也是低劣的。”

62%的青年人希望多劳多得,37%的人喜欢无所事事。不到10年前这个比例是颠倒过来的。在《快报》1979年的调查中,有27%的人向往金钱,66%的人贪图享乐。他们并不懒惰——有的专家这样认为,然而这种要求工作的愿望并不能持之以恒。他们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付出巨大努力,也可能变化多端。被社会学家卡特拉广泛使用的概念“不一致性”完全适用于时空观念。例如,当他们喜欢到国营部门工作时,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干别的事。私营部门使他们联想到泰勒制和重复的流水作业。可是照这样,让年轻人随遇而安,又从何着手大规模废除雇佣制和笨重机器呢?有两位年轻的议员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当年轻人走向生活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在私人企业里表现得对什么都不大在乎时,需要有老板的监督是不足为怪的。

反常的倒是,在很难找到工作的社会里,他们还要随心所欲,挑三拣四,向往那些有自主权的小规模企业。向青年人询问了这方面的情况,答案是,“对私人企业还不至于一知半解的年轻人,对大企业状况倒是一无所知。工作的真实性质被掩盖了起来,变得理想化,全部被电视广告宣传所替代,它们宣传的都是梦想中的职业。年轻人从中得出一种教条的形象。他们认为,有些人专门思考问题,有的人专拧螺丝钉。”但是,另一些人认为,可供选择的职业从来没有如此多种多样。

2000年的法国是一个具备科学技术、在竞争中生存、具有发明创造力的国家。而年轻人则期望那时的法国充满自由、独立、正义和平等。这个初步想法似乎成了他们当前头等重要的话题,也成了暴力的根源。

人人都想战胜艾滋病和癌症,发展微能量,看到世界各地的电视节目,做与声速同步的旅行,在宇宙空间生存,通过电子计算机认识事物。总而言之,人们梦想触及宇宙万物。人们幻想有能力选择生男还是生女,生育超智能儿,在一定距离以外求医就诊,呆在家里就能交出银行单据和食品定单,再也不用到学校读书。

令人深思的是,人们脑海中产生了对医学问题的担忧。这是萦绕在西方世界的烦恼。年轻人希望得到最佳调节。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此反映出对“内在”因素是否会在调节中产生变化的不信任,譬如待人接物、天生个性、轻度癫狂等。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效果。世间有了科学技术,人们在自身环境中的自制能力会减少。然而把握客观世界却是青年人的愿望。他们渴望在博览群书里取得进步,而不是在餐桌上,更不是卧床上。

青年人的天真和无知的可能性常被忽视,如对于长寿、抛物状天线、信用卡、家用微型电话终端机等,有相当多的年轻人并不熟悉。有61%的青年人完全是在小型电子计算机旁度过的,而且是在只有当他们想知道人们在谈论什么的时候,他们才动一动机器,对其余的问题则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因此他们对许多概念的认识都是含混不清的,如“民主”、“公民权”,甚至“衰亡”——这个令他们的长辈感到恐慌的名词都被他们“幸运地”列入幸福的概念之中。

年轻人相信科学家。法国的唯科学主义盛行,要使一个科学论题站住脚,就需要在理论上保证持久的科学性。再者,“穿白色工作服”的科学家所持有的中立立场也使青年人喜欢。他们是属于“无情欲”的一代。因此那些穿工作服的人——患有轻度偏执狂的“中性”科学家——像连环画上的典型形象,足以吸引年轻人。否定英雄形象的观点使这一代年轻人中不再出现杰出人物。他们生活在摇摆舞的文化节奏中,接受的是没有文字的知识。这是傲慢思想意识的表现。传授知识变得毫无用处。令人焦虑的否定文字文化的现象,在科学和青年人之间形成一条鸿沟,因此面对科学技术必须不断提高教育水平。除了科学家和企业家,15至20岁的小青年只相信他们自己。他们受到从未有过的优待。

对青年人来说,未来的意识形态将不受约束。他们的行为飘忽不定,左派与右派对峙的局面也许会结束。埃德加·莫兰十几年前就写过这样一段话:“不靠政治拯救一切,可能导致其它方式应运而生。”

青年人蔑视国家机器、等级观念。他们要观察,要思考,而不要幻想。人们可能抱怨他们缺乏激情,过早失去幻想。社会学家皮埃尔·马尔蒂做了总结:“青年人重又依附于传统的价值观,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男孩子似乎更有主见,女孩子更为不安分。但他们不是只顾自己,因为他们对于能否团结一致表示不安。既然他们的父母已不相信什么伟大壮举,他们更应重新创业。他们参与的是在当前特定条件下的伟大事业:赞美克己和独立性,但绝不是个人主义。‘以我为中心’和‘以我和我们为中心’的论调已不复存在。”

(法《快报》,唐薇摘译)

美国:缺乏竞争力的下一代

[美] 李·艾伊科卡

美国正处于我们前所未遇的危险之中。克莱斯勒公司属下的一个工厂里的一件小事足以说明问题之所在。在某条装配线上,我们在计算机的一个按钮上标上了3个简单的字:不适合、发动机罩、适合。那很容易念,对吗?你会认为这简直算不上什么

电脑玩意儿,任何一个6年级学生都能懂得。尽管如此,我们却还要以图代文——标上一个发动机罩的图形。

这件事使我痛切地认识到,美国是极其脆弱的,看来我们最危险之处在于我们的教育制度。我是一名企业家,而并非教育专家。我所做的一切就是经营一家企业,而且每天都问自己,“为了进行竞争,我应该做些什么?”然而,由于这个国家在教育方面所进行的工作是如此拙劣,就永远忘掉自己竟还有能力竞争!我们恰恰未能使我们的儿童掌握日后在对付国外对手时所需的手段。几乎可以肯定,在未来的很多年内,我们都将为此付出昂贵的竞争代价。

这就像我一开始所提到的故事一样。如果我的工人们只能在图画的帮助下干活,显而易见,我们的中学毕业生即使是看懂问题,也得颇费一番周折,更不用说对付它们了。

有人做过研究——我们总是研究不已,我们的中学生中,不知通货膨胀为何物的占75%;不知利润为何物的占66%;有55%的人对政府预算赤字没有丝毫概念。因此,政府预算赤字的大小对他们毫无意义。

去年,我们的毕业生中有60万人勉强会念他们的毕业文凭。(我也不会念我自己的毕业文凭,但那是用拉丁文写的,而他们的却是用英文写的!)

诚然,我们拥有一些一流的学校,还有大批富有献身精神的教师。我们的中学毕业生中,就如你在任何地方都会看到的一样,有很多是训练有素的。但是,若以国家而论来谈竞争力的话,你所依据的仅是一般水平,那么一般水平的美国学生怎么比得过呢?这就是决定我们将具有多大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质量低劣的学校削弱我们的竞争力

只有5%的美国中学生学业成绩符合许多欧洲大学的招生录取标准。在工业化的国家中,我们的孩子目前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是绝对名列榜末的。在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世界中,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计算百分比,也不知地球引力为何物的话,我们将怎样去同对手竞争?再者,他们的阅读能力简直低下到了极点。

美国企业界在为其雇员们补习数学方面所花费的钱比这个国家所有的小学、中学以及大专院校在数学教育方面所花的钱还要多。我是经营汽车制造业的人,不是补习数学的教师,但在克莱斯勒,我们每年要花费1.17亿美元用于培训,而这一费用的近10%却用于教会人们本该在学校中学会的“三会”(读、写和算基本三会)。

在摩托若拉公司,他们发现训练一个美国工人掌握统计程序控制需要花费200美元,而教会一个日本人则仅需47美分。基本上,他们在那里所要做的一切仅是递给受雇者一本手册而已。在我们这里,这办法却行不通,因为我们的工人很有可能根本读不懂。

在日本,半文盲约占人口总数的5%,而在美国,半文盲却占20—30%,那就要取决于采用哪家的数字了。

在克莱斯勒公司,我们通常把培训材料写得适合9—12年级阅读程度的人。然而,我们发现自己脱离了现实,因为公司属下的那些工厂中,有许多人仅有6年级阅读程度。为此,我们只得相应地更换我们所有的手册。在底特律,我们招收的劳动力来自这个城市。那里,中学的辍学率为50%,每日上学率约为75%,学校预算的将近30%实际上用于基础教育(另外的70%用于行政管理及学校的设施)。我手下的人中有91%从事设计、制造和推销汽车。试想一下,假若我仅有30%的人做那些工作,而70%的人纯粹人浮于事的话,我能支持多久?你能以那种方式在企业界立足吗?

不待说,我们企业界的人与教育利害攸关——你愿相信适者生存法则吗?我知道日本和南朝鲜的工人会做些什么。我曾目睹他们工作,我也看到我们从学校招来的是

些什么样的人，我不禁感到恐慌。今天，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同一的技术，但假若你的工人不比和他们一道工作的机器人更聪明伶俐的话，那就一切都完了。你根本就无法去竞争。

雇主们应该更大程度地参与教育。我并不是说要花更多的时间教我们手下的人怎样阅读，或是如何做乘法。我们应深入到问题的核心，去帮助我们的学校培养出为经营我们的事业所需要的那种人材来。

仅仅花钱去解决问题是不够的。今年美国花在教育方面的钱将是 3280 亿美元，比任何其它公用事业——包括国防——的费用都要多。我们在教育方面所花费的国民生产总值比我们国外任何一个竞争对手——包括日本和德国——都要多得多。

我们理应有更高的生产率 and 效率，因为我们已经向教育事业投入了大量纳税人的钱。我们也应该要求更高的标准。如今，一些年轻人第一件难于通过的事就是生活本身。那是因为他们被从一个年级升到另一个年级，而且终于毕业了，尽管每次升级他们都不及格。问题在于没有人告诉过他们：为了试图保护这些孩子免于不及格，我们曾做过保证。你知道那是什么吗？——这些日子里，我们耳闻了不少有关此事的议论。这叫渎职，而那就是我们在学校中正干着的事情。

对今天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已是为时太晚了。他们远远落在后面，也许永远也赶不上了。在一些人身上，我们尚能稍事弥补，那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就得从我们的小学生身上着手。

正如我们工厂中的标语所写：“第一次就做好！”如果做不好，质量下降，那么我们就停止装配线运转。我们不能在装配线的终端从事汽车的加工修补。那么，当孩子们还没有把他们的功课学好，他们的成绩还不能及格时，教师们应该让生产线停止运转，而我们也应支持那些受委任采取此举的教师们。

比其它任何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师们进行工作。眼下，我们对他们期望很大，要求他们既是教师，又是警察、社会工作者、代理家长、毒品顾问以及心理学家，而我们却让他们单枪匹马地去做这一切。

1989 年春，我在圣地亚哥同全国教育协会的人交谈时，我发现只有 25% 的家长访问过他们孩子就读的学校。如果你从来没有同供应你所需原材料的供应商商谈过，你能创造出优质的产品吗？反正我不能。

我必须将我的原料供应厂商包括在我们的企业之中，否则我不能把制造一辆汽车所需的那 1.2 万个部件装配到一起。如果你不能使家长们参与其事，我不知道你怎样把所有的部件组装成那个叫作“人”的复杂的拼成物。然而，那正是我们目前要求教育家们去做的。

学校当然是我们最大的供应者。我们不能只是对他们输送给我们的人材质量不佳感到恼火，我们应当同他们一道集中力量提高学生的质量。

像许多其它公司一样，我们克莱斯勒公司也正在试图那样做。我们那样做是因为，作为精明而讲实际的企业家，我们懂得为了有助于自己的竞争力，那是我们应当担负的责任。我们提出了一个课业计划以加强美国的学校。此计划分 3 步行动。

首先，我们必须使全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教育上存在的问题是何等严重。1989 年春，克莱斯勒公司出资在大众广播电台播出了一套“学习在美国”的节目。罗杰·穆德（前教师）为节目主持人。那是对我们在这个国家重犯的错事做一次深刻的回顾，有些事我们做对了，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学校是否能培养出我们孩子的竞争能力。

其次，我们应当确保我们的师资达到标准，然后再褒奖他们的贡献。克莱斯勒公司曾赞助全国职业教育标准委员会 50 万美元。这是一个成立还不过 3 年的新机构。其宗旨在于首次创立一套全国性的标准以及一项教师合格鉴定程序，那将有助于赋